



清史译丛



ING HISTORY

OVERSEAS



RESEARCH

▲ 第五辑

清史译丛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888 —



清史译丛

QING HISTORY
OVERSEAS RESEARCH

▲ 第五辑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组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清史译丛. 第五辑/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组.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ISBN 7-300-07424-3

I. 清…

II. 国…

III. 中国-古代史-研究-清代

IV. K249.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68409 号

清史译丛

第五辑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组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239 (出版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涿州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48×210mm 32 开本	版 次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张	9.375 插页 1	印 次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257 000	定 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出版委员会

(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大正 于 沛 朱诚如 成崇德 李文海
陈 桦 邹爱莲 孟 超 徐兆仁 戴 逸

《清史译丛》编委会

主 编：于 沛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美] 孔飞力 王大庆 王 江

王晓秋 [法] 巴斯蒂夫人

[德] 达素彬 [俄] 米亚斯尼科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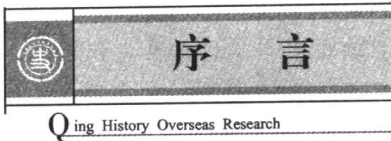
朱政惠 刘 东 张西平 [英] 吴芳斯

杨念群 赵世瑜 耿 昇 徐 浩

徐思彦 钱乘旦 虞和平 戴 寅

执行编辑：徐思彦 王大庆 戴 寅 叶柏川

康 越 唐 博



在编纂清史时，“要有世界眼光，要把清史放到世界历史的范畴中去分析、研究和评价。既要着眼中国历史的发展，又要联系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这是搞好清史编纂工作的重要原则之一。既要有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继承和弘扬中国史学的优秀传统，又要有“世界性的眼光”，这是完成新世纪我国这项重大文化工程的切实保证。

马克思说：“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大抵从15世纪、16世纪开始，直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正是在世界历史发展的这个重要的转折时期，清王朝在面对西方列强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开始融入世界。研究纂修清史的基本原则和内容时，应高度重视清王朝社会发展的世界历史背景。纂修清史要进行必要的理论准备，如何认识和体现出“世界眼光”，即是重要的理论准备之一，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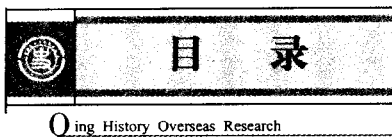
此，我们需要加紧这方面的研究。

纂修清史，既是面向全体中国人的，也是面向全世界各国家、各民族的。在诸多文化体系中，只有中华文化连绵数千年，持续发展没有中断。这个事实本身就表明中华文化具有伟大的生命力、强大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然而，这一切并不是自发地实现的，因为文化需要人来传承。今天我们纂修清史，正是在继承、发展和弘扬五千年悠久的中华文化。但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华传统文化面临着继往开来、重铸辉煌的挑战。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与世界文化进行有效的对话、交流，这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通过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交流、碰撞，中华民族文化将成为世界文化中具有独特魅力的部分。我们今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纂修清史，应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现实，积极探寻不同文化的“交汇点”，在纂修清史的过程中不仅能做到光大中华文化，而且能促进全球文明。

清史研究的中心在中国，优秀的清史专著，应该出自中国历史学家手中，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这也不排斥了解和有选择地汲取外国学者研究中的积极成果，及时地介绍和评析海外清史研究的学术思潮、前沿问题、热点问题和重要成果，加强海内外清史研究学者的交流。

正是基于上述基本认识，经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批准，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组决定编辑出版《清史译丛》，该译丛将视具体情况，通过“专题研究”、“论著及文献选译”、“学术综述”、“名家访谈”、“海外专稿”、“理论争鸣”、“新书书评”等栏目，及时地将海外清史研究的最新动态介绍到国内来。《清史译丛》是广大清史研究者、爱好者共同的园地，让我们共同用辛勤的汗水浇灌她，使其在清史纂修工程中能够做出更大的贡献。

2004年1月



论著及文献选译

1

目

录

中国文化史的特殊时期：17 世纪下半叶至 18 世纪

[俄] Б·Г·多罗宁著，叶柏川译/1

洞察乾隆：帝王的实践精神、南巡和治水政治，1736—1765

[美] 张勉治著，唐博译，董建中校/6

从鸦片贸易到中国的反鸦片战争：问题的国际性及

其应对之道的国际化

[德] 达索彬著，孟虹译/61

传教士的关系网与社会转型：以粤东北为例

[德] 特拉尔夫·克莱恩著，孙立新译/84

“把愚昧者、无赖和懦夫改造成正派人”：清末监狱的产生

[德] 余凯思著，蒋锐译/113

1881 年中俄《彼得堡条约》之修订

[俄] E·A·别洛夫著，陈春华译/139

与修改俄中改订条约相关的帝俄外交部档案文件

陈春华等译/161

英国驻华公使馆武官布朗上校有关满洲的笔记

吴乃华摘译/179

法国外交档案文献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

葛夫平摘译/221

学术综述

清代城市史：地方精英的权力基础与社会网络

——1990年以来英语发表的清史著作综述之九

马 钊/245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中央国家档案馆所藏中国资料

[哈] K·哈菲佐娃著，阿拉腾奥其尔译/252

图书评介

2

清史译丛

《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译后感

定宜庄/258

《天津的盐商：中华帝国晚期的政府建构与市民社会》评介

[美] 伊丽莎白·科尔著，唐博译/267

阶段成果

法国所藏有关清史档案介绍

葛夫平/272

论点摘要

“后十六世纪问题”与清朝

[日] 岸本美绪/283

作为生存策略的清代一妻多夫现象

[美] 苏成捷/285

美国近代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趋向

邢福增/287

范发迪新作《英国博物学者在19世纪的中国：

科学、帝国与文化冲突》

祝平一/289

德国对义和团运动的镇压

[韩] 车琬爱/291

中国文化史的特殊时期： 17 世纪下半叶至 18 世纪

□ [俄] Б·Г·多罗宁 著

□ 叶柏川 译

1
论著及文献选译

清朝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帝国精神文化的进程从清朝建立一直持续到 19 世纪初。19 世纪后，其性质发生了根本改变。这些年代发生的许多事件已经十分清楚，但是作为中华帝国文化生活中的特殊现象，这一进程却没有得到关注。我试图简要描述这一进程最主要的特点。

首先，早在清朝建立之初，统治者就对精神文化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关注。（这里我指的是汉族文化，满族文化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也是清朝皇帝关注的对象——这是一个特殊的题目）尽管当时清政权还未能控制全国，并且宫廷里进行着激烈的斗争，但这并没有影响它在这一领域采取重大举措。统治者对精神文化

进行了严酷的监控。这也使清朝皇帝的地位得到提升：他们（首先是康熙和乾隆）希望成为与缔造中华文明的古代皇帝齐名的英明圣主。在帝国的国家机器中出现了大量专门从事文化事务的机构，而翰林院在其存在千年后，首次成为执行统治者文化政策的帝国主要机构之一。某些中国历史学家称这一政策为“文化专制”。下面我谈谈这一时期的书本文化的情况。从孔夫子开始，在中国一直注重这一文化。清朝统治者的活动涵盖了整个社会的基础文化建设。它可以划分为两个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的方面。

一方面，全面审查保存下来的文献。审查从王朝建立之初开始实行，直到我们研究的阶段结束。所采取的审查方法，在不同时期是不同的，如文字狱，审查古籍正文，对古籍进行注释、续编、补充等。这样一来，后人接受的绝大部分古籍是经清朝学者之手修订过的（这一点往往被人们忽略，尽管它非常重要）。其中最重要的典籍被收入乾隆皇帝下令编纂的“四库全书”。它是关于清统治者这方面活动的一种总结。为了保存这部分图书，在故宫里建立了“文渊阁”。中国人民大学的黄爱平教授出版了介绍这套全书的专著。

另一方面，清廷决定在其严格监控下，组织编写人文领域各个方面的基础性著作。中华帝国学者的创作还从未如此富有成效。据中国历史学家记载，康熙和乾隆统治时期，每年出版2~3种书籍，这样在短期内，就创作了大量文献，其中有许多被收入民族文化的宝库。这是值得中国人引以为豪的，它们至今仍具有重要意义。我简单列举其中的几部著作：儒家经典及其注释《朱熹文集》、世界最大的百科全书《古今图书集成》、中国第一部官方词典《康熙字典》、一部重要的类书体裁的著作《佩文韵府》、第一部唐诗全集《全唐诗》、《明史》（这部书被认为是同类体裁文献中写得最好的一部）。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方志”（在中国大约有9000部）、“通鉴”、“纪事本末”体裁的著作。17世纪末，清朝学者创作的新体裁“方略”开始发展起来（这在中华帝国文化中极为少见），百科全书“三通”（“政书”体裁）被充实为六

部大型著作，清代学者编写的《四库全书总目纲要》结束了汉代刘氏父子对中国图书的分类。这一时期完成的许多文集，在故宫里的专门机构武英殿首次出版，属于“殿本”。

以上列举的现象，并非仅仅是在我们所考察阶段的清朝文化史中出现的规模巨大却昙花一现的插曲，而且也是在贯彻一项经过深思熟虑的政策。

1645年，在宣布明史编纂工程启动后，清统治者开始大量搜集文献（似乎是这项工作必须的），这种大规模搜集文献的活动后来转变为“文化专制”和对文化遗产进行全面校正。纂修明史也是组织“博学鸿词科”考试（1679年）的表面理由。博学鸿词科考试在解决清朝统治者遇到的重大问题中起到重要作用。《明史》于1739年编纂完成并出版，这促使清统治者开始编写有关本朝及前代历史的基础性著作。

清朝统治者在民族文化的其他方面同样做了积极的工作。这一切都是在国家处于非汉民族统治下、确立政权的斗争持续了几十年并且外部危机不断加重的情况下发生的。在这种局面下，宫廷似乎应该将精力集中在其他问题上，但它却将文化问题作为自身政策的一个主要方面，并且为实施这个政策不遗余力，投资巨大（当时著作的编写和出版费用很高）。显然，这肯定是有非常重要的原因。我认为，应该从清朝刚刚建立时中国国内局势的特点中寻求原因。我们知道，明朝是在整个帝国发生危机的情况下退出历史舞台的。中国以前的历史文献在公认的“前明”学说的基础上解释朝代的更替，将这些危机大大简化了。朝代更迭的过程仅仅用简单概括的方式来描述。但是，许多问题都取决于能否正确理解当时的历史。

我认为，造成明朝灭亡的16—17世纪的危机，不是一个王朝的危机，而是它所代表的体制的危机。这种危机破坏了国家传统的基础，中国社会开始倒退和崩溃。而周围世界正在努力进行的变革则更加剧了这一危机。在精神文化领域也未能幸免。我不谈泛泛的特征，只是介绍一下这些危机的特点。

这是中华帝国官方儒家学说在漫长历史中第一次遭遇的最严

重的危机。这一学说遭到严厉批判，人们在寻找可以替代它的学说，宫廷里逐渐放弃道教。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三教”体系开始崩溃，人们尝试创造新的宗教，尝试重新审视有关社会与个体之间的关系，这破坏了已经形成的社会体制。传统的连接精英阶层和宫廷的纽带出现断裂。上层社会更多的是坚持与政权对立的立场。明代精英阶层的堡垒——“书院”，在明末成为区域联合体的中心（东林党、复社，其成员人数众多）。时人撰写的关于明末的著作（根据清代学者的记载，此类著作不少于千种），公开尖锐地批评现行制度。

明末，儒家道德体系开始了前所未有的衰落和淡化过程。社会中流行着一种新的声色犬马的生活方式，它使许多在此前无法想象的东西都出现了。同时代的人以吃惊的目光观察并描述着发生的事件，描述着令社会震惊的普遍的丧失理智。这一时代的标志是激烈批判儒家学说的放荡不羁的李贽（1527—1602）（研究者称他为疯人学派）和著名小说《金瓶梅》。

16 世纪末、17 世纪初在精神文化领域里出现的问题是前所未有的。明朝统治者没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发生于 17 世纪中叶的朝代更迭也无法自动消解这场危机。这是新的统治者所面临的需要解决的问题。这决定着他们的未来。

事实证明，清朝统治者早已洞悉这一点。从理论上讲，可以有多种方法解决这一问题，但是由于当时具体的环境和主要兵力用于同明朝作战，事实上没有一种方案是可行的。于是，清廷决定扼杀明末出现的危险倾向并动用一切手段巩固国家和社会生活的传统基础。持续增长的危机规模巨大，矛盾尖锐，这从外部要求政权制定出成熟的、长期的、目标明确的政策。通常认为，这一政策是从康熙时期开始执行的，事实上，它是在清朝建立之初就已经形成了。

纵观历史，清朝统治者十分成功地解决了所面临的问题，他们将精神文化的发展纳入了其必须的轨道。17 世纪下半叶至 18 世纪，在清统治者的庇护下出现了一种与明末显然不同的文化；从各方面看，它都不同于以往朝代的文化，尽管它们有着共同的

根源。这种文化的基础是官方的。在统一了国家学说的秩序并确定了其基本优势之后，清朝统治者将其和帝国精神文化所有的进程与自己编写图书的活动紧密结合起来。清朝在撰写文献著作方面取得的成绩在很多方面超过了以往的历朝历代，其中的某些著作具有极高的水平。这一时期占核心地位的历史著作，在四部中也处于主导位置。官方的历史著作开始同儒家经典接近，这得到了政府的支持。文化吸收了政府认为有价值的历史时期的遗产。17—18 世纪文化的缔造者是统治者苦心培养的新的学者精英阶层，显然，这是中华帝国前所未有的。他们成功地团结了这一阶层，并将其变成文化专制的强大支柱。

17 世纪下半叶至 18 世纪的文化现象是独一无二的，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可以将其作为中华帝国文化发展的独特总结，是它的顶峰。由于定位为经典，它本身比较传统，要在此基础上创造出新的东西是极其困难的，这使中国社会在临近 19 世纪时遇到许多复杂的问题，也难适应新的条件。

我认为，17—18 世纪在精神文化领域里发生的事件，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许多这一时期发生的但仍未研究透彻的问题，修正对这些事件的评价。但是，这已经是另一个题目了。

作者 Б·Г·多罗宁，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教授。

译者叶柏川，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

洞察乾隆：帝王的实践精神、 南巡和治水政治，1736—1765*

□ [美] 张勉治 著

□ 唐 博 译

□ 董建中 校

6

清史译丛

大部分清史学者对康熙帝和乾隆帝的南巡耳熟能详。^① 南巡的多重性质引起了关于南巡目的及其历史意义的诸多讨论。^② 然而历史学家倾向于将南巡几乎只是看做行政管理和政策制定，特

* 本文译自《帝制晚期中国》24卷2期，2003年12月，51~108页（Michael G. Chang, “Fathoming Qianlong: Imperial Activism, the Southern Tours, and Politics of Water Control, 1736–1795”, *Late Imperial China*, vol. 24, no. 2, Dec. 2003, pp. 51–108）。——译者注

我应该首先感谢美国学术组织委员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乔治·梅森大学历史与艺术史学系，国会图书馆（约翰·克拉格中心和亚洲部），卢斯基基金会等所提供的制度上的支持和帮助，这些支持和帮助使研究和论文撰写得以完成，我也要感谢琼·布里斯托（Joan Bristol）、罗伯特·迪卡罗里（Robert DeCaroli）、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苏珊·冯塞布尼尔（Susan R. Fernsebner）、华盛顿传统中国研讨会的与会学者以及《帝制晚期中国》的三位匿名审读者对本文初稿提出的批评、指正和建议。他们提供了建设性的建议，帮助我纠正了内容和文体上的大量错误。本文仍然存在的不足之处由我独自承担责任。

① 康熙帝（1654—1722，1661—1722年在位）在1684、1689、1699、1703、1705和1707年进行了南巡。他的孙子乾隆帝（1711—1799，1736—1795年在位），在1751、1757、1762、1765、1780和1784年进行了六次南巡。

② 关于乾隆朝南巡更为详细的史学研究，参见张勉治：《马背上的朝廷：满洲少数民族王朝的统治在中国的建立，1751—1784》，4~17页，圣迭戈加州大学博士论文，2001。

别是治水政策制定的途径。^①事实上，南巡与治水的关系纠葛纷纭，两者有着重叠的历史，经常被人合二为一。已有的关于南巡和治水之间明确关系的历史讨论，是围绕着皇帝动机和行政统治的熟练程度而进行的：康熙和乾隆的南巡是为了治水政治吗？如果是，那么南巡取得了什么效果？他们的南巡做出了哪些贡献？

关于康熙南巡的大量研究成果遵循了这一探询的线索。其结果是将康熙南巡描述成治理黄河的政治实践：“玄烨六次南巡的主要任务是治理黄河。虽然也兼有‘省方察吏’、了解民情以及笼络争取南方知识分子的目的，然而这都属于次要的。”^②这样，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将治河非政治化了，而且政治和权力问题被放在了“次要”位置。尽管一些学者对上述其他一些“次要”方面有所触及^③，但更广泛的意见仍认为，康熙南巡主要是为治理黄河的行政管理和政策导向问题做准备。^④就此而言，康熙在南巡中表现出的不是作为政治嗅觉敏锐的统治者形象，而是在明清鼎革的混乱之后，加速恢复经济、重建社会秩序的勤政和务实的管理者形象。^⑤

现代史学家忽略治水的政治内涵以及完全用管理的工具主义来解释南巡与治河之间的关系，这种倾向可以追溯到清朝官员以及康熙、乾隆本人的官方话语的表达。官僚及皇帝都宣称南巡在

① “治水”在一般意义上是指一系列范围广泛的活动，包括农业灌溉的创立，防洪与河流治理。在这里，我使用这个概念更多地只是狭义地指中华帝国晚期勉力维持的治水，与黄河一大运河大规模水利基础工程的管理问题。

② 商鸿逵：《康熙南巡与治理黄河》，见左步青编：《康雍乾三帝评议》，124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6。

③ 王振忠：《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11～32页，北京，三联书店，1996；史景迁：《曹寅与康熙：奴才和主子》，124～157页，耶鲁大学出版社，1966；吴秀良：《通向权力之路：康熙和他的继承人，1661—1722》，83～105页，哈佛大学出版社，1979。

④ 孟昭信：《康熙大帝全传》，354～397页，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

⑤ 商鸿逵：《清前期经济恢复的进程、稳定及其成就，1681—1735》，载《中国史研究》，28～31页，总15期，1981—1982年秋冬季1～2期。

于视察重要的水利设施。起居注官记述的1684年11月24日康熙帝首次南巡就是完全为了治水：

上以黄河屡岁冲决，久为民害，欲亲至其地，相度形势，察视河工，命驾南巡，于是日启行。^①

清朝官员也将乾隆的南巡描述成治水行动——特别是治河。1749年10月，七位省级高官联名上书，请求皇帝巡幸他们所辖的省份。其所列举的原因中最重要的莫过于治河的重要性：

一经銮辂亲临，黄运河湖之全局，江冲海汛之戎政，悉在圣明睿照之中。诸凡修守机宜操防要领，臣等亲承指示，庶几知所遵循。^②

毫不奇怪，乾隆帝以康熙所开创的充满政治用意的南巡证明自己的南巡是合理的。在1784年一篇题为《南巡记》的文章中，乾隆写道：“我皇祖六度南巡，予藐躬敬而法之。兹六度之典幸成，亦不可以无言……南巡之事，莫大于河工”^③。

乾隆对南巡的自述表明了他在治水方面的勤勉和实践精神，这只是加强了解释其南巡在学术上的倾向——不论肯定还是否定——都根据的是行政效用的标准。对于乾隆所宣称的南巡最重要的任务是水利建设的说法，颇有影响的著名清史专家萧一山深表怀疑：

观于此，则六度南巡之事业，乃其自述也，亦不过如

① 《康熙起居注》卷二，1241页。在此之前，严格说来康熙只是东巡到达山东泰山的神峰。

② 联名建议的七位官员是：两江总督黄廷桂、江南河道总督高斌、漕运总督瑚宝、副总河张师载、安徽巡抚卫哲治、江苏巡抚雅尔哈善、两淮盐政吉庆等。见《南巡盛典》卷一〇六，1a、2b~3a页。

③ 《钦定南巡盛典》卷首上，2a页。